

貳



范培松 文集

范培松
文集

貳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培松文集. 第2卷 / 范培松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99-2227-7

I. ①范… II. ①范… III. ①范培松—文集②散文—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2408号

- 书 名 范培松文集(第二卷)
作 者 范培松
责任编辑 徐宗文 周敬芝
装帧设计 张金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电话 025-68037410)
厂 址 江苏南京市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7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2227-7
定 价 81.00元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658837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在苏州市平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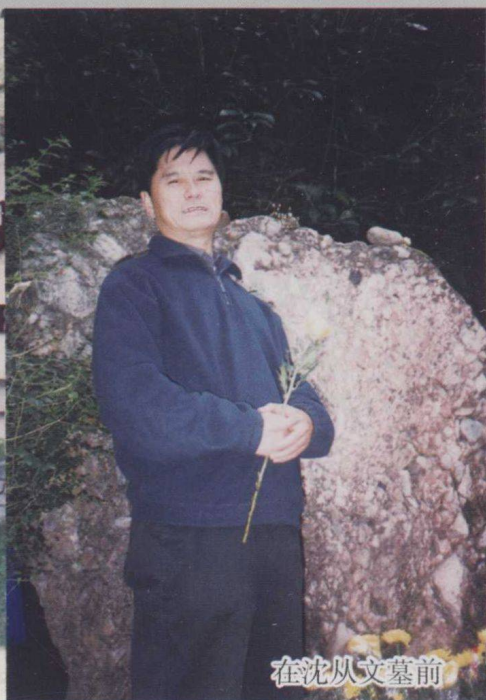
和台湾中正大学副校长周英雄
(后)、香港中文大学李达三
教授在苏州网师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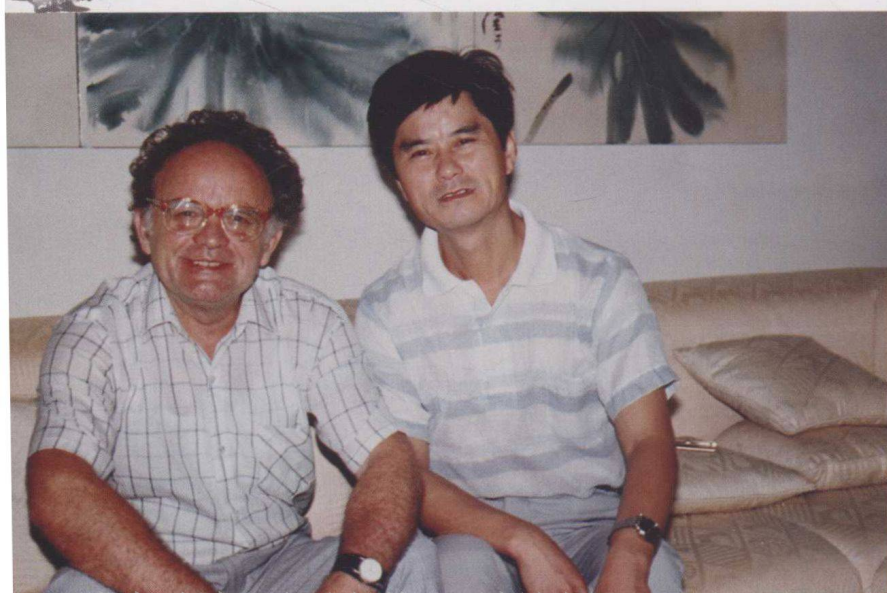
与夫人女儿在印度恒河游船上



在香港中文大学



在沈从文墓前



与捷克汉学家
高立克教授在一起



在莫斯科大学



在湘西张家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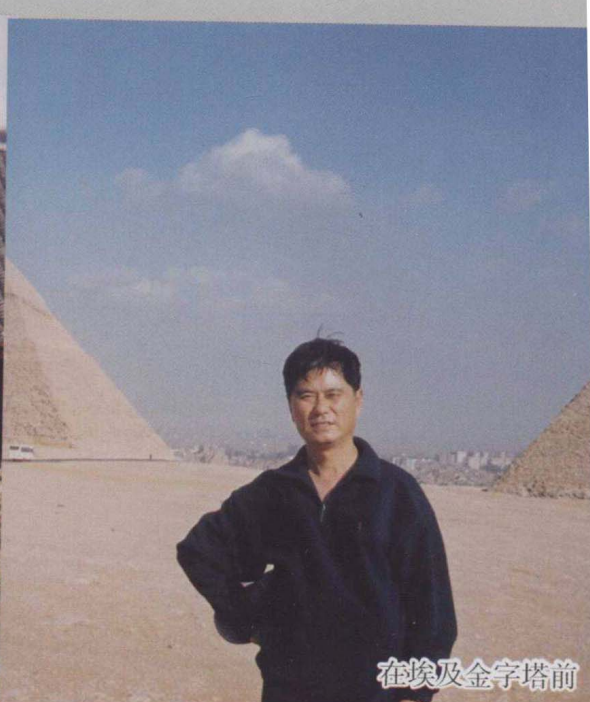
范培松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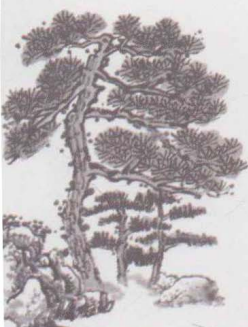
与范伯群教授在一起



在呼兰河萧红纪念馆前



在埃及金字塔前



与贾平凹、黄德伟在香港

目 录

第十四章	“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的散文	3
第一节	角色转换:“工农兵”代言人的提出和确立	3
第二节	“工农兵”代言人的首次集体亮相:军旅散文	12
第三节	“工农兵”代言人的变脸艺术:散文“当诗一样写”	21
第四节	与体制不和谐的声音	42
第十五章	转折:后“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的散文(上)	51
第一节	文化精神特征	51
第二节	巴金的《随想录》和回应	63
第三节	哀祭散文	78
第四节	游记	88
第十六章	转折:后“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的散文(下)	96
第五节	江南散文	96
第六节	孙犁	109
第七节	汪曾祺 张中行	117
第八节	贾平凹	131
第十七章	台湾散文	144
第一节	概述	144
第二节	诗化散文:余光中、杨牧	152
第三节	人文小品:王鼎钧、张晓风和亮轩	159
第四节	思乡小品:琦君、林海音和艾雯	170
第十八章	香港散文	181
第一节	都市文化背景下的港味散文	181

第二节 叶灵凤 曹聚仁	186
第三节 陈之藩 思果	191

第四编 和而不同(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末)

第十九章 “散文热”:重塑“自我”灵魂的狂欢	201
第一节 “散文热”整体观	201
第二节 “散文热”中的散文嬗变	207
第二十章 文化散文	216
第一节 散文体式变革	216
第二节 文化批判散文	232
第三节 民间思想随笔	257
第二十一章 西部散文	275
第一节 世纪末最后一个散文流派	275
第二节 主要作家(一)	284
第三节 主要作家(二)	295
第二十二章 女性散文	314
第一节 活跃的女性散文潮	314
第二节 社会派女性散文	321
第三节 抒情派女性散文	332
第二十三章 其他类散文作家	340
第一节 人生诘难散文	340
第二节 江南斜姿散文	345
第三节 回忆散文	358
第二十四章 台湾散文	366
第一节 自由至上:散文的精神时尚	366
第二节 都市散文	374
第三节 乡土散文	382
第四节 田园散文	389

第二十五章 香港散文	394
第一节 概述	394
第二节 学者散文	399
第三节 其他散文作家	415
附论:澳门散文	421
参考书目	424

消逝聚合(四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中期)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下)

第十四章 “工农兵”代言人 时代的散文

第三编

消融聚合(四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中期)

一、特色特殊的现象：于头味的《野百合花》及其批判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这是中国大陆的散文进入了“革命”的“大造时代”。它有一个标志，即从七十年代中期“文革”开始为前后期区分的标志。从七十年代中期到“文革”开始，是“工农兵”代言人时代。这一时期，散文创作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这是树立权威的时代。战争是权威，党是权威，枪杆子是权威，笔杆子是权威。当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整个中国处在国共双方的势力范围之中，阶级斗争以战争的形式出现，战争主宰了一切。散文创作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必须作出选择。在此之前，这一选择就已经在解放战争之前，四十年代中期，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就是要打破文坛各出新的局面。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文艺工作的重要。他在1949年1月延安创刊的《中国文艺》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这一时期，散文创作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十四章 “工农兵”代言人 时代的散文

第一节 角色转换：“工农兵”代 言人的提出和确立

一、角色转换的艰难：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及其批判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在近半个世纪中，中国大陆的散文进入了“工农兵”代言人的时代。诚然，它有前后期之分，可以七十年代中期“文革”结束为前后期区分的标志，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是后“工农兵”代言人时代。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这是树立权威的时代。战争是权威，党派是权威，枪杆子是权威，权力是权威。当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整个中国处在国共对立的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中。阶级斗争以战争的形式出现，战争主宰了一切。散文家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对抗中必须作出选择。其实在之前，这一选择就已经严峻地摆在面前，四十年代初，发生在延安的文艺整风，就是要求散文家作出新的选择。

当时代车轮刚刚驶入四十年代，毛泽东就已意识到文化的重要。他在1940年1月延安创刊的《中国文化》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新民主主义论》，用大量的篇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认识和立场，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①。尽管这种立场表述是纲要性质的蓝图描绘，但有一点是具体的、清晰的，而且是毫不动摇的，就是新文化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69页。

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①这里的“无产阶级领导”是非常落实的、具体的,其含义应是管理,指挥,服从。毛泽东坚持的是两条,一条是党指挥枪,另一条是党指挥文化。文化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文化必须服从党派和权力的权威,必须服从意识形态的权威,散文绝不能例外。

但这一切并没有引起当时延安作家的足够重视。从延安作家队伍的结构来看,大部分是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投奔而来的,跟随武装部队从江西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来的极少,这一结构决定了他们对延安的认识心态上的差异。作为当时共产党的军事人员和领导者来说,他们是九死一生,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终于在延安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延安是命根子,他们已无路可走。而且延安处在日军和国民党围困之中,在战时特定环境下,延安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再从权力管理系统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体系非常严密,形成一种国中之国的割据局面。这种割据,决定了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并理所当然地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视延安发生的一切,以确保政权的巩固。延安的安全和稳定高于一切。对于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投奔而来的大批作家来说,他们的心态不同。他们是满怀激情,为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来到延安,他们把延安视为理想的王国和完美的圣地。作家们又非常敏感,他们在延安的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另一面,那就是等级制度、干部庸俗的心态以及享乐主义等等。作家们把理想和完美视为高于一切,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王实味在《政治家·艺术家》中就用文学的手法描述了这两种不同心态的冲突:“有些以政治家自傲的人,望到艺术家便嘴角浮漾着冷讽的微笑;另有些人以艺术家自高的人,提到政治家也要耸耸肩膀。其实,客观反映总都有些真理,最好是彼此都把对方当作是镜子照一照自己。不要忘记:彼此同是带着肮脏黑暗的旧中国的儿女呀!”^②

倘若冲突双方仅仅是“冷讽的微笑”和“耸耸肩膀”,事情就简单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严重和残酷远比人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在近半个世纪里酿造了许多冤案。而发生在四十年代初批判王实味的这场冲突,竟成为二十世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59页。

② 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谷雨》1942年3月17日。

纪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沉重话题。

冲突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事情的缘起是在1942年春天,当时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王实味、萧军、丁玲、艾青和罗烽等的杂文。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1922年入北京大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和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抗战前夕去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他在1942年3月13日、23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杂文《野百合花》,在1942年3月17日《谷雨》上发表了杂文《政治家·艺术家》。萧军(1908—1987),辽宁义县人。早年就读于东北陆军讲武堂,曾在东北宪兵教练处任少尉军事及武术助教。“九一八”事变后,拟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后逃赴哈尔滨,在哈尔滨与萧红出版短篇小说合集《跋涉》。1933年他和萧红逃到上海。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由鲁迅亲自撰序推荐出版,声名大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武汉参加《七月》刊物编辑工作。次年去延安,后辗转 to 四川,从事工人业余文艺教学工作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再赴延安,主编《文艺日报》。他在1942年4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杂文《论同志之“爱”与“耐”》。丁玲(1904—1986),湖南临澧人。1921年到上海入平民学校,次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了一年左右到北京。1927年发表处女作《梦珂》,接着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影响颇大。1936年逃离南京到达延安,曾任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1941年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2年3月9日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第98期上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艾青(1910—1996),浙江金华人。早年曾赴巴黎习画,后来开始写诗,1936年出版的诗集《大堰河》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1941年辗转到了延安,一度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主编诗刊。1942年3月11日,他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第100期上发表了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1909—1991),辽宁沈阳人。1928年毕业于哈尔滨呼海铁路练习所。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杨靖宇领导下担任哈尔滨东区委宣委,创办《文艺》、《夜哨》周刊。抗战爆发后去武汉,参与编辑半月刊《哨岗》。武汉沦陷后他去了重庆,继续从事革命文学活动。1941年赴延安,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席。1942年3月12日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第101期上发表了杂文《还是杂文的时代》。

这批性质相似的杂文在同一年出现,显示了这样五个共同特点:第一,这批杂文作家都是抗战前后从国统区和沦陷区进入延安的,在到达延安之前,他们已有了较大的文名和声望,不是一般作家。第二,这批杂文都发表在延安

最权威的刊物《解放日报》上,影响很大。第三,时间集中,都发表在1942年春天。第四,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延安现实中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第五,在文体上均是杂文,对问题的揭露和批判是以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方式呈现的。它们成了第一批公开发表的批评延安的意见书。散文的文体特征,决定了它在这场冲突中充当了出头鸟的角色。

这批杂文集中揭露和批判了延安的阴暗面和黑暗面,揭露是无情的。以《野百合花》为例,它的要害是“野”。“野”在于它认为延安有“黑暗”,有些人“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①!尤其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②在这一点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也作了同样的揭露。另外,《野百合花》还对延安缺乏“爱”,对一些干部只顾自身享乐,只顾自己的一点利益等庸俗丑陋现象也提出了批判。艾青、萧军、罗烽等的杂文也基本上是对这些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尤其是罗烽提出的“还是杂文的时代”成了这批杂文的理论依据和口号、旗帜。

如果客观来看这些揭露和批判,应该是可以容忍和允许的。但问题在于,它们的集中出现,在延安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还把王实味捧为“延安的鲁迅”。由于延安的政权和体制,是从江西根据地延续而来,是以军事手段建立起来的,战争环境中凭借军事手段建立起来的政权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从江西到延安,从来没有任何人(包括作家)对这一权威发动批判和挑战;而且这种权威在战时环境中保持高度警惕。罗烽在《还是杂文的时代》中说道,“延安是政治警觉性表现的最高的地方”。因此,对延安政权的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尤其是它在群众中引起的轰动效应,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期间,毛泽东对这一局面曾作了这样的评价:“19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③文学问题一下就转化成政治问题。1942

① 王实味:《野百合花》,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② 同上,第11页。

③ 转引自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文汇月刊》1988年第5期。

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从5月27日开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对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进行批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用政治手段,动用权力来解决文学问题,开创了把文学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的先河。批判者成了被批判者,成了敌人。丁玲作了自我批判。王实味最后以“反党五人集团”和托派问题被捕,并于1947年被错误地处决。

这里特别要提一提,在对王实味等人的批判上,运用了群众批判的手段,它不同程度地动员广大群众参加,以会议的形式展开。如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的批判,当时中央研究院开始以座谈会形式进行批判。座谈会从1942年5月27日开始,到6月11日结束,共开了十六天,期间开了十四次大会。当时会议参加者对6月8日的座谈会作了这样的记述:“从早晨七点起,就不断地像潮水一样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他们来自七十几个机关(学校在内)。”^①一千多个人对一个人批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鲁迅曾说:“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②不幸,鲁迅的话成了王实味等的谏语,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大陆文坛上对作家和作品时常运用群众批判的手段。当群众在一种权威体制运作下变成一种专制、一种暴力时,它就可能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王实味等在群众批判下,完全失去了语言的感觉,因为群众批判重复着战斗的刺激的语言,形成一种声势、一种压迫、一种结论。王实味们终于败下阵来。

《野百合花》等杂文的出现,使毛泽东等人认识到,除了政治权威、军事权威以外,还要建立文化权威,而且建立文化权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蓝图开始了全面具体的规划。

二、“工农兵”代言人角色的确立:散文“非知识分子”写作时代的开始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对散文的直接影响是,要求散文家成为“工农兵”的代言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

① 温济泽等著:《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②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